

1911—2011

百年楊超

——杨超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下

编委会
◎
编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百年楊超

——杨超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下

编委会◎编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第⑥编

体道怀德 哲思睿智 >>>



1982年7月，杨超（前排左七）在大连参加毛泽东哲学思想专题讨论会。



1994年，杨超（前排左十）参加四川省中华文化学会暨儒学·道学·佛学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大会。



1981年春，杨超（前排左六）在成都参加吕子方教授遗著研讨会。



1983年12月，杨超（前排左七）倡议的中国《山海经》学术讨论会在成都召开。



1985年11月，杨超（第二排中）于湖南湘潭参加老子学术研讨会。



1984年，杨超（前排左四）与何郝炬（前排左五）等于《当代中国》四川卷编辑部成立会后留影。



1991年5月31日，《当代中国的四川》暨《当代四川》丛书举行首发式。
左起：杨万选、聂荣贵、杨超、何郝炬、天宝。

1992年7月，出席全国大禹及夏文化研讨会的代表合影（局部）。前排：左四为杨超，左三为廖伯康，左六为韩邦彦（时任四川省副省长）。



2005年10月9日，杨超（前排左六）出席《巴蜀文化通史》编纂工作启动座谈会。



2006年8月，杨超（左二）、章玉钧（左三）参加“国学现代化与构建和谐社会国际论坛”。



杨超是一个先行者

■ 廖伯康

我在四川生活和工作这么多年，这些老领导当中，令我印象最深、最敬重的是两位学者型的老同志——秀熟老和超公。

张秀熟老于192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川西特委书记并兼任中共历史上的第一任成都市委书记。1928年4月被推举为省委代理书记。新中国成立后，秀熟老主要在文教战线工作，先后担任四川省副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为四川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94年3月过百岁后才过世。

杨超同志也是以近百岁的高龄谢世的。他这个人的特点是为人谦和，做事执著，是学识广泛又多才多艺的领导人。

杨超同志对《易经》《山海经》《道德经》感兴趣，很早就提倡“三经”研究。他在思想、艺术、精神上超凡脱俗，但又能够与大家打成一片。我对杨超同志的书法和画作如松、竹、菊有印象，那些画反映出他的人品。他给那些搞艺术的人讲话，大家都很容易地听得进去。为了新成立的省诗书画院，他那么地平易近人，从要人、要钱到要地皮上凡事亲力亲为，令人佩服。

1987年3月30日，杨尚昆（后中）等参观重庆画院。廖伯康（左一）、杨超（前执笔者）、杨汝岱（右一）陪同。



现在农村里很多人都晓得用沼气方便、卫生，用处很多，但在过去人们还不了解沼气的时候，为了普及沼气和搞好沼气，杨超同志经常到基层，一一地说服县长，说服队长，说服农民，几乎是用苦行僧的办法去动员老百姓修沼气池，为解决农民的实际生活问题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凡是有新到四川上任的省委第一书记，不管人家同意不同意，杨超同志反复去找他们讲攀西；凡是他去北京所见到的领导们，逢人就说攀西；对于攀西开发，现在更能够看出杨超同志的远见卓识；他对攀西有感情，也很执著，非常难得。

四川是有文化的地方，有人提倡文化，有人重视文化。在这些方面，杨超同志是一个先行者，他在我四川是攀西开发的先行者，是搞沼气的先行者，是省诗书画院的先行者，不愧是四川的“达县三杰”。

（廖伯康：曾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政协主席）

深思 透明 执著^[1]

■ 章玉钧

在杨超同志百年诞辰的前夕，读完了杨潇为缅怀双亲而写的传记《百年长歌》，深深为老领导杨超和他夫人罗迭的多彩人生和人性光辉所打动，也引发了对杨老生前往事的追忆，他的音容笑貌似又重现眼前。

这部传记之所以有较强的可读性和感染力，首先是传主的生平可以折射出中国百年巨变的主要轨迹，在老一辈革命者中既具典型性，又有独特的个性。杨超与辛亥革命同年，跨世纪活了九十六岁。大革命时期在达州家乡同张爱萍等一起闹学潮，20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入党后，过了五年铁窗生活，与方毅等坚持狱中斗争。国共达成二次合作后出狱赴延安，在马列学院、中央文委当过艾思奇的助手，参加毛泽东主持的六人哲学小组，随后在中央社会部任职。1941年他与延安中央医院护士长罗迭结为夫妻，相依相伴六十六年。重庆谈判时他俩在南方局做情报工作。解放战争期间奉毛、周之命，杨超与于江震等率四川干部队到鄂西开拓新区。新中国成立前夕调回中央，先后任中央统战部一室主任和周恩来副主席政治秘书，夜以继日地为建国大业奔波操劳。1950年，为了充实实际工作经验，他主动要求从中央下放基层，从此更加精神抖擞、振奋昂扬地在巴蜀大地为祖国建设战斗了五十七载，先后担任地委书记、省总工会主席、省委工业部长、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省政协主席等职，分管过计划、建设、工交、冶金、能源、科技、地质、防震、沼气等工作。为开发西部宝藏，两度请缨，扎根攀西。离休

[1] 本文系为杨潇《百年长歌》一书撰写的序言。

之后，继续为攀西规划开发、思想文化工作、诗书画院、扶贫事业等竭尽全力。总之，革命年代杨超多次处于风口浪尖，建设时期则始终奋战在火热的第一线，是中国现当代许多大事要事的亲历者。他在巴山蜀水间成长和活动近八十载，他的经历几乎可以反映出整部四川现当代史。

这部传记之所以打动人、感染人，还因为杨潇为此作下了大工夫，努力复原历史的本真，字里行间又流淌着和煦的温情。作为杨超、罗迭的三女儿，她与父母共同生活近一个甲子，膝下承欢，情浓意深，视角独特，观察入微。她早有愿望为父母写传，用了好几年时间收集资料，以唠家常的方式掏爹妈的口述，常常是“打破沙锅甑（问）到底”，又按线索遍访当事人，并多次到档案馆核查资料。“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个碎片经过合理拼接，终于使原来比较模糊的某些史实，逐渐明晰起来。杨潇曾长期担任《科幻世界》杂志社主编、社长，曾获中国韬奋出版奖。她秉青史留真之素志，展细腻流畅之文笔，如春蚕吐丝结茧，织成五十余万言的长篇，把百年沧桑娓娓道来，其中重现了不少鲜为人知而又感人肺腑的往事。同时，全书不搞“客里空”，不来“甄士隐”（真事隐），如实写出爸爸少年时的“迁翻”、顽劣，写他如何从不成熟走向成熟，写他曾有的失误与遗憾，写他晚年返老还童的天真……由此，便写活了杨老的性格和人品，写出了有血有肉、可亲可感的真实生命。

说到杨老的性格和人品，不由得想起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件往事。一天，什邡县（今什邡市）一个乡镇举办庆典，杨老应邀参加。会前参观几个科技型企业，我陪他到了一家民营小厂，叫“康德水晶”，以制售人造水晶产品为业。杨老笑着说，这厂名真有意思。参观后，老板请他题词，杨老略一思忖，提笔写下“像康德那样深思，像水晶那样透明”。现在想来，这两句，正可作为杨老的“夫子自道”。“深思”，是学者的睿智；“透明”，是仁者的高洁；如果再加上一个“执著”——行者的刚毅，我看就大体上可以概括杨老的人品和性格了。

先说“深思”。杨超在延安时就有“黑格尔”之称，他曾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里的名句给我题词：“思维着的精神是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

杨老非常爱动脑筋，而且想得很深沉，逻辑思维能力和形象思维能力都非常寻常。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即使在牢狱、“牛棚”里，他的大脑也从没有停歇过对人间正道和国计民生问题的思索。他是站在革命和建设前线的实践家，同时又是率先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前沿的理论家。

“文革”后期，他痛定思痛，把对革命和建设曲折历程的深入反思提升到哲学理论的高度，最早拿出系统论述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学术著作，继后又首倡研究邓小平理论，都在全国产生了轰动性的影响，起到开风气之先的导向作用。杨老十分重视中华文化的传承，对儒、释、道各家学说广泛涉猎。有段时间他身体不好，我受省委领导之嘱，几次前去看望，见他总是在研究《易经》《道德经》《山海经》，还兴致勃勃地给我谈读“三经”的体悟。年近九十时，他到都江堰龙池参加大禹文化研讨会，带头作了学术发言。在龙池散步时对我说，出生于西羌蜀地的大禹，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是伟大的治水英雄和促进民族融合的先驱，要像祭拜炎黄二帝那样永远纪念他。他同杨析综同志早就倡议组织编纂《巴蜀文化通史》，以带动巴蜀文化的传承和弘扬。2005年，他精力已明显衰退，但得知老同志们一起商量此事，亲自到会并带头在建议信上签名。可以告慰杨老的是，作为我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委托项目的《巴蜀文化通史》二十二卷本，经过五年奋战，已全面进入定稿阶段，不久将分批交付出版。

“透明”，是杨老襟怀坦荡、肝胆照人的人格写照。杨老每一步的人生选择，往往以革命的现实需要与自身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作为出发点。他始终以革命利益为重，不图升迁，不恋权位，一生多次主动要求下派到艰苦的一线工作。新中国成立初期那一次，他居然上书毛主席，申请离开中南海、西花厅，离开周总理办公室的重要岗位。这在旁人看来简直难以想象，但杨超出于对基层工作的渴望，却坦然而贸然地这样做了（他事后对敬爱的总理老是感到愧疚）。1958年，身为省委工业部长的他，主动要求到西昌，担任西昌工业区建设委员会主任，并将全家都搬了去。1977年，作为省委老书记的他，又要求兼任西昌规划开发委员会主任，不久又任渡口（今攀枝花）市委第一书记。听说1974年调他到中央工

作，他却委婉地推辞了。如果不是心地透明、淡泊名利的人，是不会这样做的。杨老的坦荡透明，还表现在日常的待人接物上。他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有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心里装着老百姓，始终保持一颗赤子之心，犹如“一片冰心在玉壶”。他尊重知识、爱惜人才、助人为乐、广交朋友。不论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三教九流，他都乐于平等交往，倾听各方面的意见，为他们排忧解难，并从他们那里得到教益。

再说杨老对事业的执著奉献。他在四川省分管过许多方面的工作，不管是热门还是冷门，不管原来是否熟悉，他都是充满激情地投入，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干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出类拔萃。在杨超手里，冷门也会抓热，抓得风车斗转，成绩斐然。原来很不起眼的沼气，他努力组织、领导、推广，乃至逢会必讲。时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赵紫阳开玩笑说：

“干脆把沼气改个名，叫‘杨超气’算了！”四川农村沼气的成就，得到邓小平的肯定和鼓励，也吸引了全球有识之士的目光。这项生物能源技术已从四川推广到全国乃至很多发展中国家。杨老对攀西开发尤其情有独钟，我听他在会上、会下多次讲攀西大峡谷这个聚宝盆在地球上多么罕有、多么宝贵，钒钛磁铁矿的综合利用多么重要，“吃了豆腐渣，丢了金娃娃”多么可惜。他为攀西开发付出了几十年心血。方毅副总理八下攀西，他五次陪同。离休后还到攀西调研十多趟，思路更加开阔地向中央提出了把攀西和滇西北金沙江沿线列为资源经济开发区的建议，为后来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提供了思想资料。中央领导同志称誉他是“革命的老黄牛”。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三不朽”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这三条，杨老全都做到了。他心地透明以立德，执著奉献以立功，勤学深思以立言，永远是革命、建设后来人的楷模。

让杨老仁者、学者、行者的风范永远与我们相伴同行，鼓舞我们继续共同创造人民的幸福生活和民族的美好未来。

（章玉钧：曾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

传承弘扬巴蜀文化的领军人

■ 章玉钧 谭继和 万本根

提起杨老，人们几乎众口一词：他是“左派黑格尔”，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但是，对于他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奋进者，传承弘扬巴蜀文化的领军人，人们就知之不多，乃至知之甚少！

杨超老是1987年从四川省政协主席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这时他七十六岁，已过古稀年纪。杨超老1925～1927年在四川达县中学读书时，就与同乡同窗好友张爱萍、魏传统一起阅读爱国进步书籍，追求救国真理，参加学潮，罢课游行，反对封建军阀和国家主义派。1928年在成都外国语专科学校求学时，参加学运，1929年加入青年团。1931年赴沪找党，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理想与信念——为民族求解放，为人民谋幸福，就辉映杨超老终生。

杨超老卸下工作重担，却并未赋闲在家。他把注意力和精力，转向了攀西开发规划、四川的工业建设与科技事业、扶贫工作等，转向了思想文化事业和诗书画文学艺术。杨超老对家人说：“回首往事，为时尚早，我的目光要朝前看。”他对朋友们说：“这边我从工作上退了，那边我就从学术上跟进！”

事实上，杨超老早就做了思想准备。“文革”结束时，他已六十五岁。从四川省委书记岗位退下后，1983年他就任四川省政协主席、省顾

委常委。这时他已开始满腔热情地考虑从事学术文化和思想理论方面的事业。

1983年，在杨超老的倡议和支持下，四川省社科院创办了独树一帜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季刊《毛泽东思想研究》，他亲任编委会主任和主编。

1984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了全国古籍整理领导小组，随之联络各地著名专家学者，拟有规模、有深度地整理点校一批学术文化典籍，其涵盖上下数千年来的哲学、历史、儒学、道学、医学、经济等各门类，取名《中华大典》。杨超老得知此消息后，十分兴奋，当即萌发了创办一个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刊物的想法。他认为，整理中华传统文化典籍固然重要，但研究工作也得跟上，而且应该与马列主义相结合。从那以后，杨超老在与四川省社科院、四川大学、巴蜀书社的接触中，多次表达了上述看法，殷切期望并强烈要求在研究马列主义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大家应群策群力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一、主持创办《中华文化论坛》杂志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后，在学术文化领域掀起了一股文化研究的热潮，中原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此时，杨超老到北京参加全国古籍整理领导小组会。在会上，他激动地表示，为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他正倡议创办《中华文化论坛》杂志。原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和原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周林听后甚为赞许，认为时机已经成熟。

杨超老从北京回川后，又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的倡议引起了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高度关注，省委书记和省长为此特批了开办经费；他的倡议也得到了时任四川省社科院院长刘茂才，副院长谭洛非、万本根，哲学所所长陈德述、副所长黄海德等人的大力支持；他的倡议还取得了成都恩威集团公司总裁薛永新和四川省中华文化学会的大力协助。有了人力、物力、财力的必要保障，经四川省新闻出版局批准，由四川省社科院主管的综合性文化学术内部季刊

《中华文化论坛》终于在1994年3月创刊面世。杨超老亲任编委会主任。1996年时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杨析综受杨超老之邀，也愉快地接受担任编委会主任。

在杨超老的直接领导下，《中华文化论坛》一出版就气势不凡！

创刊号封面上—尊中国传统的石狮雕刻，气势雄浑而深远，象征着五千年的中华民族已是睡狮醒来，封面下部的画像汉砖则象征着办刊方向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整个刊物大气磅礴，印刷精美，品味高雅。

《中华文化论坛》鲜明地宣布它的办刊宗旨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以邓小平理论为指针，“弘扬中华文化，光大民族传统美德，繁荣社会科学研究，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并且以“立足四川，面向全国，走向世界”为己任。这个宗旨立即得到了国内外、海内外学术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热烈回应，许多专家学者、老同志和著名人士都积极为刊物写稿。例如，北京的肖克、胡绳、张岱年、季羨林、任继愈、王定国、冯征、姜思毅、汤一介、张黎群、丁伟志、牟钟鉴、方立天、方克立、张立文等，港台及海外的饶宗颐、刘述先、童恩正、杜维明、陈大络、成中英、巴姆、沟口雄三等，四川的袁珂、马识途、李绍明、胡昭曦、隗瀛涛、王文才、林向、冉光荣、张正明等都把他们的新作投寄刊物。这样，《中华文化论坛》从一开始就突破了地域的界限，拥有了大批的作者和读者群。

根据杨超老的意见：办刊要“立足巴蜀，面向中外；观古观今，朝向实践”。《中华文化论坛》开辟了《中华文化笔谈》《海外学者看中华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爱国主义与传统文化》《中华文化的源与流》《中华儒学文化》《中华道学文化》《中华佛学文化》《易经·道德经·山海经研究》《中华地域文化》《巴蜀文化研究》《三国文化研究》《学者谈治学》《中华文化在海外》等专栏。其后又增辟了《传统文化与现管理》、《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长江文化研究》、《老一辈学者论中华文化与巴蜀文化》、《和合文化研究》等栏目。刊物力求把理论性与现实性、学术性与通俗性结合起来，达到雅俗共赏；把尊重专家学者

与扶植人文社科新人结合起来，形成老中青三结合的作者队伍。

在杨超老的关注下，《中华文化论坛》始终突出了如下特点：第一，高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旗帜，关注现实社会生活，着眼于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第二，全面开展对中华儒学、道学、佛学文化的研究。第三，重视区域文化的研究。第四，尤其重视巴蜀文化的研究。为了积极促进巴蜀文化研究进一步蓬勃发展，刊物编辑部与四川省中华文化学会于1998年6月在成都龙泉驿举办了“巴蜀文化论著选题研讨会”。四川省和重庆市的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文学、哲学、宗教、法学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及社科界领导共二十余人出席了会议。《中华文化论坛》编委会名誉主任杨超、杨析综在会上反复强调指出，巴蜀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共存共荣的经济文化区，有着共同的历史命运和共同的发展前景，分则两伤，合则两全。经过充分讨论，与会者达成了共识：一致认为必须从战略高度看问题，将巴蜀文化结合为一体进行研究。大家对巴蜀文化研究的方向、前景和各类选题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会后，刊物编辑部经梳理系统形成了八十多个选题，有计划地约请相关专家学者进行研究、撰著，扎扎实实地推动巴蜀文化的研究。这些情况后由杨超、杨析综写信报告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得到了他们的充分肯定和支持。

至1998年初，《中华文化论坛》出版的十多期刊物，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编辑部收到数千封来自海内外和各地的来稿来信，肯定和赞扬《中华文化论坛》是一本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有益于社会文明和振兴中华的学术文化刊物。台湾一家在世界享有盛名的学术月刊《中国文化》，要求与《中华文化论坛》结为姊妹刊，希望在弘扬中华文化上“海峡两岸互相辉映”。在杨超、杨析综亲切关怀和支持帮助下，1998年初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式批准《中华文化论坛》为国内外公开发行刊物。以后《中华文化论坛》又先后成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双核心”期刊。